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7 April 200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00 年实务会议

2000 年 7 月 5 日至 8 月 1 日，纽约

临时议程* 项目 14(b)

社会和人权问题：社会发展

2000 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概述

1. 《2000 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是关于该主题的一系列报告中的第十五次报告。这些报告从 1952 年开始编写。这一系列报告的主要目的是简明扼要地定期总结从社会角度观察到的全球发展情况。以下各段概述这些主题领域的主要趋势和发展，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参考。报告全文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作为联合国销售出版物发行。

2. 《2000 年报告》分为六章。第一章（再生产和生产）回顾人口趋势和经济趋势。第二章（体制）重点讨论影响家庭、社会群体、民间社会和各种公共机构情况和受其影响的当前社会变化。第三章（生活条件趋势：成就参差不齐）说明生活条件的趋势和基本服务的提供情况，特别注意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不同社会群体或收入阶层之间这些情况如何不同。第四章（社会弊病）重点论述当代特别令人关注的若干社会问题或社会弊病，包括歧视、武装冲突、形形色色的暴力、腐败和犯罪。第五章（教育、技术和信息：社会变化的主导方面）评估教育、信息和技术这三者的发展对社会和社会内部各个群体的持续不断的影响。这三者的发展对各国和各个社会群体的福利的影响

越来越大。第六章（老问题，新挑战：平等及其道德含义）指明了一系列的发展态势，预计这些发展态势今后数年和数十年内很可能对社会形态产生深刻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生活的许多方面，影响深远。各个社会如何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公共和私人的努力——应付这些发展态势引起的挑战，对于决定未来的前景也至关重要。《2000 年报告》六个章节的主题和主要结论如下：

一. 再生产和生产

3. 在千年之交，人口到达了几个里程碑，世界人口超过 60 亿，差不多用一代人的时间就翻了一番，即大约从 1960 年以来翻了一番。

4.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现象，而且尽管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相关的死亡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最年轻的分区——的中间年龄也首次呈上升趋势。整个发展中国家，中间年龄达到了 24 岁，自 1975 年的低点以来增加了 5 岁。较发达国家的中间年龄稳定在 37 岁的水平上，自 1960 年以

* E/2000/100。

来增加了 8 岁。就全球而言,达到和超过 80 岁的人口已有 7 000 万之多。在发达国家,60 岁和 60 岁以上年龄组的人数首次超过 15 岁以下年龄组。全球出生预期寿命增加了;发展中区域与较发达区域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从 1960 年的 22 岁缩短至 2000 年不足 12 岁。妇女预期寿命的相应差距从 24 岁缩短至大约 14 岁,男子的差距从 20 岁缩短至大约 9 岁。全球预期寿命的性别差距从 3 岁增至 4 岁,女性较长。

5. 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继续放慢,现已达到了年增长率 1.2%(发展中区域为 1.4%,而较发达区域为 0.4%)。生育率的继续下降是人口增长速度放慢的唯一因素。在世界一级,每个妇女生育的子女数隔了一代时间已从略少于 5 名减少至略少于 3 名(发展中区域从 6 名减少至 3 名,较发达区域从 2.7 名减少至 1.6 名)。每名妇女生 2.1 名或低于 2.1 名孩子的国家数已达到 61 个,人口总计 26 亿,或占全球人口的 44%。欧洲许多国家的人口即将出现下降趋势。

6. 全球人口分布变化明显。发展中区域现在居住着全球 80%的人口,比 1960 年的 70%增加了。同期,这些区域的人口密度提高一倍多,从每平方公里 25 人增至 59 人,而较发达区域从 17 人增至 25 人。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人口大量流动。城市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48%(发展中区域为 40%),而 1960 年占 34%(发展中区域为 22%)。同期,人口达到或超过 100 万的城镇数目从 112 座增至 372 座,而人口达到或超过 500 万的城市从 14 座增至 45 座。居住在非出生国的人数从 1960 年不足 7500 万增至 2000 年 1.25 亿左右,但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始终相当稳定,约占 2.2%。

7. 不断增长的经济能够产生满足全体人民基本需要所需的货物和服务,并能增加生产性工作的机会,它是社会赖以进步的物质基础。不断扩展的经济本身并不表示社会进步,也确实不表明普遍福利的改善,但如果经济不扩展,要提高生活水准和使千百万人民摆脱日复一日为生存而挣扎就几乎无从谈起。

8. 近几年来,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的经验是,经济基础狭窄的国家,如按人均收入计量那样,事实证明也

大都最缺乏活力,其结果是已经巨大的差距变为这些国家与经济上最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在全球一级,1990 年代末形势的特点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受严重挫折(反映东亚的金融危机)随后出现部分复苏;东欧和前苏联转型国家五年左右产出大幅度下降后经济停滞不前;北美增长势头强劲,西欧增长幅度不大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差不多陷于停顿状态。

9. 在整个 1990 年代的十年间,按人均尺度衡量,发展中国家经济扩展的速度快于上个十年(每年分别增长 1.9%比 0.3%),而且也快于 1990 年代的发达国家(1.5%)。相反,后者 1980 年代的增长速度(2.3%)快于 1990 年代(1.5%),也快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两类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在 1980 年代扩大,在 1990 年代缩小。在二十年内,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之比略有缩小,从刚过二十分之一降至刚低于二十分之一。在同期,在发展中国家中,非洲的人均经济产出大幅度收缩,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出也收缩,但不太明显。相形之下,东亚和南亚,特别是中国的产出增长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结果是东亚和南亚的人均产出与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出的差距大大缩小,从 1980 年代初大约 50:1 降至 1990 年代末大约 30:1,而非洲的产出与发达国家的产出之间的差距大幅度扩大,从 25:1 增至 40:1。在 1980 年代初,非洲的人均产出高于东亚和南亚的人均产出,大于 2:1,但现在却低三分之一左右。转型国家的人均产出也下降了,下降幅度约为 40%,甚至比非洲还快,但转型国家的起点要高得多。

10. 各国经济业绩的如此多样性,发生在全球经济环境深刻变化的时期。1990 年代末的世界经济与 1980 年代初根本不同。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组织原则,市场模式明显压倒了指令模式;各国经济更加开放,因此也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特别是基础最薄弱的经济体;外国资本的流动更加自由,但流量在地域上更加集中(不利于前景较暗淡的较贫穷的经济体),而且也更加多变;越来越多国家的公营部门在私营部门面前节节后退,在这种背景下,公有资本流量收缩,再次使全球资本流动发生倾斜而不利于较虚弱的经

经济体。消费和生产的结构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服务业相对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比重增加了；由于利用了过去积累的科学技术创新，大量的新产品上市了；关键部门的生产方法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机器取代了人，生产设施易地，以及公司结构和管理方面进行重大改组等，都属于意义重大的其他变化。多数国家同通货膨胀作了有力的斗争并大多控制了通货膨胀，在许多情况下给人口中较贫穷的阶层带来了直接的好处，但可以认为，这种做法牺牲了总体经济增长，至少在中期内是如此；财政赤字消灭了或大幅度减少了，这种成果应归因于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增强和通货膨胀的降低。不过，包括社会方案在内的公共服务收缩的内含成本以及对公营部门下岗雇员的直接损害，多少抵销了这种成果。

11. 各国作出了调整和牺牲以便立足于更有效地应付下个世纪的挑战和抓住新的机遇。显而易见，像过去那样，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各国内部也并不是所有的人口群体，在这种努力中都会取得成功。显然存在着危险，即二十世纪初的全球化的经历将会重演，当时世界各地出现了融入全球经济的“现代”飞地，而“偏僻地区”则被遗弃在“进步”主流之外随波逐流。

二. 体制

12. 各种组合形式的家庭顶住了来自形形色色乌托邦式的空想家、暴君和极权主义国家的种种挑战。家庭作为社会化和供养的基本单位的续存，以及它在新环境下再生的能力，足以证明这种古老的机构在当代世界具有适应力和继续存在的意义。虽然离婚率呈上升趋势，而且世界各地有许多年轻人推迟结婚，但组织新家庭的冲动依然很强烈，尽管家庭的传统定义正在发生变化。有人试图使非传统形式的“家庭”合法化，可将这种做法视为进一步确认对组成家庭所暗示的对等义务的公开承诺的重要性，而不是对家庭观念的挑战。与此同时，数十年中，家庭经历了快速而深刻的转变，影响到它的规模和结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在更广大的社区和整个社会内的作用。

13. 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具有代表性的核心家庭规模大大缩小了。只是经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典型家庭的子女数减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3名和较发达国家的1.6名，而上一代分别为6名和2.7名。此种快速转变的一个后果是，今后较多家庭的近亲人数将逐代减少，这样渐渐地拥有活着的近亲的人将越来越少。如果父亲大量遗弃家庭，或单亲人数多，或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猖獗流传，这种趋势将会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随着预期寿命继续延长，将出现更多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和甚至五世同堂的家庭。没有近亲的、孤单活着的人数和多世同堂家庭的数目同时增加，这是世界未曾遇到过的新情况，而且它也没有如何满足他们多种需要的经验。

14. 家庭作为生产的经济单位的作用一直在缩小，现在它的意义主要限于小规模农业、商业买卖、手工艺和个人服务，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不过，家庭仍是向包括老弱病残在内的家庭成员提供抚养和照料的主要机构安排，这种抚养和照料在互惠的基础上进行，不求马上回报。虽然抚养和照料的制度存续着，但它面临着不断遭到人口、经济和社会力量削弱的危险。亲属关系网日益缩小，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重要性日趋下降。除此以外，家庭成员之间的实际距离拉大，武装冲突造成家庭离散，遗弃和离婚造成家庭解体，以及获得政府机构援助的资格标准等，都依然是削弱家庭持续不断地提供高质量抚养和照料的能力的因素。

15. 近几年来家庭生活内部动态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是逐步更明确地并常常在法律上承认家庭成员个人的权利。历来的传统是家长，通常是男性，拥有控制家庭的特权，这种特权虽然受到社会和道德制约，但很少受到法律制约，现在已更经常地属于法律制裁的范围，受害人报告家庭内暴力行为，特别是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比以前方便了，而且当局更愿意对此种信息采取行动。

16. 妇女在法定权利以及在机会的事实上的平等化方面，已取得明显的进展。在许多方面，妇女的状况

有了改善，有时是明显的改善，这表现为妇女能够充分地行使她们获得承认的权利，参与公民生活和政治生活和享有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与此同时，原有的虐待和不公正现象继续存在，家庭范围以外的机会经常被横加剥夺，而且妇女还普遍受到种种难以形容的歧视。情况因地而异，不仅国与国之间，而且各国内部差别很大。因此，在很少受过正规教育的比较贫困的阶层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和大城市的贫民窟，妇女的状况尤其艰难，首先受到不公正待遇和剥削的就是妇女。例如，生存战略就歧视妇女，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女孩退学总是先于男孩。妇女的收入低得可怜；更糟的是，这种收入经常是子女唯一的扶养来源，这就更使情况雪上加霜；不过近年来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妇女在获得有酬就业机会方面比男子更加成功。正如后面几部分更充分说明的那样，由于某些活动的扩大，例如性旅游业和儿童色情作品，以及贩卖妇女从事契约劳动或卖淫——这类贩卖活动经常由犯罪网络组织，而且其范围越来越具有国际性——正在使妇女工种的原有剥削形式的影响加重了。

17. 过去十年的一个特点是，有些当局倒行逆施，使妇女的处境发生倒退，关于妇女问题的一系列国际文书按常规对此作出了评定和证实。它们借用对妇女在社会中适当地位和男女双方各自角色的替代的——通常是“传统的”——解释，以此证明这些倒行逆施的正确。这是一个特别有针对性的例子，说明在试图将普遍价值观与文化相对性调和时遇到的困难。

18. 妇女走出家门找到有薪工作的人数和比例在增加，这使她们有了更大的经济保障感和独立性，随之也对她们的生活掌握了更大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这种成效是有代价的，因为社会反应迟缓，对于妇女参加全日制有薪工作后要求妇女履行其传统任务的责任不能及时作出调整。她们既要外出工作，又要继续履行持家和养育子女的主要责任，这种所谓的双重负担常常仍是妇女生活的主要写照。评估世界妇女总体情况是变好了还是变糟了，就像评估许多社会现象一样，不能采用简单的加减法，使人对情况好坏一目了然，只需略作解释就成。

19. 在家庭内，特别是在家庭外，作为整体儿童和青少年的日子相对不好过。甚至在许多发达国家 and 经济转型国家，儿童贫困的程度也加剧了，在先前的数十年中，这些国家就业率高，而且在普遍享受免费基本服务和各种家庭——特别是大家庭——补贴方面社会供给程度也高，因此儿童贫困的状况曾经大为减轻。在发展中国家，许多方面的情况仍然很危急，儿童贫困的发生率正在迅速上升。除了中高收入的家庭外，大家庭的子女陷入贫困状态的可能性最大。许多儿童在不利健康和苛严的条件下工作，工资微薄，用以补充家庭收入的不足。据估计，全球约有 1.2 亿 15 岁以下的儿童从事全日制工作。另有大约 1.3 亿儿童从事非全日制工作。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儿童被迫离开穷苦家庭，被遗弃，或逃出家门，以求朝不保夕地活下去，经常沦为流落街头的儿童。

20.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15 岁以下儿童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都一直在下降，但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依然很高，目前约为三分之一，而在发达国家不到五分之一。随着此种比例进一步下降，可以预计，一般家庭的压力会有所减轻。与此同时，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和儿童在总人口中比例下降，大家庭与贫困的联系甚至将会更加紧密。在区域一级，可从非洲的数据看出这一点，该区域的人均收入最低，而且 15 岁以下儿童的比例最高即占 43%，据预测，到 2010 年这一数字会略有下降，降至 40%。

21. 贫困和机会缺乏现在是，将来继续是世界很多也许是大多数儿童难逃的命运，但其他人的生活水准高于以往，而且未来前景也更看好。各国内部的反差仍将非常明显，而且最近的将来仍有可能扩大而不是缩小，最明显的是发展中国家，但在发达国家也能看到这种现象。同样意味深长但影响有所不同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预计今后还将扩大。

22. 同样，15 至 24 岁的青少年面临着非常不同的前途，这要看他们出生在什么地方和什么家庭。在发达国家，大多数年轻人享受前所未有的自由、购买力控制权、教育机会和工作报酬优厚的前景；为数较少的

年轻人，主要是来自贫穷家庭或移民家庭的年轻人，或来自少数民族群体或其他受歧视群体的年轻人，前途较为暗淡。在发展中国家，许多或大多数年轻人前途暗淡，这种前途可以简洁地描述为真实反映发展中国家大多数青年的前途。看来非洲青年的前途特别艰难。

23. 在发达国家，青年人享有国家提供和保障的退休金和免费的基本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服务，已使昔日的贫穷一去不复返了。青年人一方面处境孤独或与外界疏远，另一方面在生活上又不时(可能长期地)依赖于他人，这是他们(及其亲属)面临的新问题，而社区又不得不穷于应付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和与寿命延长联系在一起的其他种种费用。在这些国家，老人在人口中的比例高得多(目前为 20%，到 2020 年预计将提高到 26%)，因此它们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其中包括改革公共退休金制度，以便这些制度能够满足当前及今后退休人员的预期和需要，并在未来的社会中能够适应实际情况和执行下去，未来社会面临的经济和人口情况，与现行制度形成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一个不同但同样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利用老年人的技能和聪明才智来造福于整个社会。

24. 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总数中，老年人所占的比例较小(60 岁及以上年龄占 8%)，但他们的人数和在总数中的重要性正在迅速增加和提高(1960 年为 6%，到 2020 年预计将增至 11%)。就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口而言，更重大的任务是在可能的条件下维护和支撑家庭和社区，并且在为不再能够独立生活的人建立收入保障和支助制度的同时，为老年人建立一种体制，让他们在社会上发挥有益和生产性作用。

25. 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联系依然很密切，而且一代人与一代人依然休戚相关。与此同时，也有迹象表明存在着潜在冲突，不同年龄组的关系在疏远，其后果目前尚无法预测。

26. 高龄老人中残疾现象很普遍，而且所有年龄组中都存在。全球残疾人数目巨大，约有 6 亿人(不过，

对于哪些人应算作残疾人，其定义，目前没有，而且今后也不一定会取得一致意见)。近几年来，有多种因素促成残疾发生率上升，包括疾病、意外事故和武装冲突。对残疾人的态度形形色色，从敌视到容忍到怜悯都有。虽然仍有一群人将残疾视为一种耻辱，但目前更多的人认为必须面对或解决残疾问题，这项工作应由残疾人和整个社会共同承担。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满足残疾人的各种需要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价值观。

27. 在生活的许多方面，近年来民间社会组织的贡献已变得更加重要，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这些国家的此类组织最近刚出现，成为新的主要参与组织，但它们的作用并不总是很明确。民间社会的界限经常很模糊，它包括众多有组织或非正式的团体的活动，但有一种共同的利益将它们团结在一起，而营利性私营企业或地方一级或国家一级的政府并不能为这种共同的利益提供充分的服务。

28. 可以发现民间社会组织作用方面的几大趋势。重要的传统行为主体如工会，其影响力已经缩小，最明显地表现在它们在世界各地的成员数方面。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组织的成员增加了，而且活动范围也相应扩大。

29. 发展中国家成立了许多新的民间社会团体以促进特定的事业，以及更多组织正规的非政府组织，在有些情况下是受了可从国外获得经费的鼓舞而成立。转型国家中也可看到类似的趋势。不过，它们在实现为之成立的目标方面的经历各有不同。但是毫无疑问，世界各地各类非营利组织的重要性正在提高，至少在数量上是如此，它们活动的范围也正在扩大，而且正如就合作社运动的例子已提到的，成员数也在增加。全球范围内传统工会的成员数在减少，但在某些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工会成员数正在增加，在这些国家，政治变革与主要产业部门的快速增长相结合，使得组织工会和吸收新会员较不费劲。

30. 在民间社会和“市场”发生变化的同时，可以注意到，许多国家各级政府的职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体现在政府活动的范围方面，各级政府履行基本职能的方式方面，也体现在它们对公民的责任方面。

31. 统观新世纪这头几个月的世界政治地图，要领会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差不多半个世纪中发生的变化不是件易事。非殖民化过程差不多花了半个世纪，这在现代史上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同时进行的还有建立或重建国家的过程。两个过程的一个后果是便利强大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崛起和对形形色色一党制政府或独裁政府的容忍，它们打着要将完全不同的社区联合在新的国家中和调动资源促进发展努力的名义，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

32. 非殖民化过程在这最后的十年中结束，而是在这十年中出现了各国政权民主合法化的过程，其途径有举行多党选举，各国政府加入国际人权文书和表示拒绝独裁统治形式。这十年还出现了几个主要国家的互解。有些国家还发生了另一种戏剧性事件，它们保持了领土完整，但实验了移交权力的各种形式，包括修改宪法，规定更大程度的区域或地方自治，这样做的目的有时是应付分裂主义运动，有时是预先制止这种运动。在这十年中，还在不同的层面上发生了将国家主权自愿移交给超国家机构(如欧洲联盟和其他一些区域和全球合作安排)的情况，以及出现了以前理所当然地认为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的新挑战，特别是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领域。行政机构下放权力是又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题，它与一个范围更广的举措一致，即减少阻碍公民和公司积极性的各种形式的管理、控制和官僚主义办法，如果应用于国际交易，一般将这种倾向说成是全球化。

33. 过去十年中另一个特点是探索新办法以满足社会需要，包括所有区域各国准备、提供社会服务和为此筹措资金：发达国家改革福利国家制度，转型国家国家供给制度崩溃后修订社会议程，而发展中国家对社会“安全网”产生新的兴趣，其中有的遭受了金融动荡造成的经济挫折(如东亚)，有的进行基本结构变革(如拉丁美洲等地)，有的经历了长期的停滞，甚至经济倒退(如非洲)。

34. 经济管理和方针方面的根本变化是近年来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它极其戏剧性地发生在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向面向市场经济国家的彻底转变过程中。同样重要的是全球普遍采用面向市场的方法处理经济政策，它的特点是取消管制，不由政府直接插手生产过程，更严格地控制公共开支从而消减，甚至消失国营部门的财政赤字，以及基本上完成包括基本公用事业在内的公有产业的私有化过程。如此广泛的变化对经济状况会有什么长期影响是无法预见的，更不用说谁是赢家和谁是输家了。不过，在短期内，挑起变革重担的人一般总是最不能挑重担的人。

35. 经济管理方面的这些发展事态反映在政府财政的最新趋势中，特别是政府开支的水平和方向中及总体财政平衡中。政府支出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人均收入水平类似或结构特征类似的国家中，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离差巨大(从大约 20%到 50%或更多不等)。但是中央政府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这种趋势近年来，实际上数十年来没有变化。

36. 特别重要的是按目的分类的政府开支方向的变化。在发达国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1970 年代初的大约 4%降到了 1990 年代末的大约一半即 2%。相形之下，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增加了大约一半，即从几乎 9%增加到了 13%以上，保健开支从 2.5%上升到了 3.5%；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教育开支大致维持原有水平，即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在发展中国家，国防开支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略有上升，但后来再次回落到 1970 年代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2.5%的水平。社会保障和福利开支从不到 2%增加到了 3%，保健开支从刚过 1%增加到了接近 2%，而教育开支大体保持不变，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5%左右。这些只是中央政府开支的数据，而在有些国家，州、省和地方政府对教育、卫生和福利负有主要责任；特别是在联邦制国家，邦政府的教育开支超过中央政府数倍，而且保健开支也很可观。因此，这些数字往往低估了这

些领域的政府开支；不过，一段时间内的趋势仍然能够说明些问题。

三. 生活条件趋势：成就参差不齐

37. 工作是大多数成年人甚至是许多儿童的生活经历的中心。它是衡量多数人对经济的贡献和衡量他们对国家经济的货物和服务产出的权利要求的尺度。人们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以及社区赋予它的价值，往往确定一个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地位。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展，经济结构变得更加复杂，而且职业任务也变得更加专门化，仅次于他们的家庭境况的人们的就业决定人际关系，并在社区中给他们安排一个明确的位置。

38. 四个工作领域值得注意，而且近年来每个领域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可获工作的数量，所提供工作的条件，工作所提供的收入或生计，以及可获就业机会的保障和它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收入的保障。

39. 在发达国家，工作的人绝大多数受雇领取工资或薪金，自营职业的人不断减少，尽管近年来有所回升。提供一种经济环境，它既能产生雇用所有求职者所需的工作岗位，同时又符合其他的宏观目标，包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低通货膨胀，一直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目前各国政府更加重视充分就业或高就业率，这种方针与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政策态势形成鲜明的对比。北美的失业率已降至 4% 左右，而欧洲联盟的失业率则徘徊在 10% 左右，欧洲大陆较大的经济体特别高。虽然失业率近年来普遍较低，但大多仍然高于 1975 年以前的水平。

40. 可以注意到就业格局和失业有五种趋势。长期失业仍是主要的社会问题。长期失业始终存在，特别持续存在于这样一些地方：高度集中于特定地域的全部产业都收缩，使大量流动能力较低的熟练和半熟练的中老年工人陷于失业，其他工作机会又寥寥无几。尽管制定了许多计划来解决没有社会技能或工作技能从事最低级工作的年轻人找工作难的问题，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少数族裔年轻男子的就业前景最为暗

淡。长期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人们在较年轻时就离开全时劳动力，其中一部分非出于本人自愿，但这样一些人更经常的是自愿离开，他们能够期待退休后得到经济保障，并有一技之长，适合于依靠兼职工作或临时工作补充其退休金的不足。在所有国家，妇女在有酬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比以前提高了；实际上，许多发达国家中妇女在劳动力中接近半数，这无异于一场社会革命。最后，但在总体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的地方，依然存在着既缺特定技能的情况又有公民不愿接受的工作空缺的现象；这两种工作现在更多的是靠移民劳力填补。

41. 经济转型国家的工人正在进行调整，以适应从有保障就业的制度向受经济结构调整和私有化影响的捉摸不定的劳动力市场条件的转变，因此他们面临着非常特殊的情况。不同的失业率表明各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部分反映出各国实行经济改革所达到的阶段，部分反映出各国实行旨在减轻转型影响的社会政策。它们普遍避免了大规模的失业，但是许多工人迟迟领不到工资或领到的工资被通货膨胀抵消，而且就业无保障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妇女的一个新的生活特点。

42. 经济增长快速的发展中国家，就业机会增加的速度高于劳动力增加的速度，特别是在东亚。在有些国家，有薪就业现已成为它们的经济的重要部分。因此，1990 年代末的金融危机造成大量人员公开失业。

43. 在非洲，全时就业人数在劳动力中的比例不高，公开失业通常为城市现象，集中于数目有限的人口群体如中途退学者。恰好大量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之时，各国经济增长缓慢或甚至正在收缩。公营部门就业人数的削减进一步恶化了就业形势，公营部门就业人数的削减经常是与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工作一起进行的。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出现了类似现象，城市公开失业的大量增加，与被雇用人数众多并存。

44. 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工人继续从事许多构成非正规经济的不同活动谋生，或继续从农业找活路。据估计全球劳动力总量约为 30 亿，按此衡量，估计有 7.5

亿至 10 亿人就业不足，他们主要在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部门和自然农业部门工作。

45. 此种“就业”的主要特征是不稳定，劳动生产率低下，因此收入也非常低。在经济上不稳定的同时，还受到敲诈勒索者和犯罪集团的骚扰，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受到当局的骚扰。另一种不同的不稳定影响着经济转型国家的雇员，他们从工作几乎全包的一个极端转到了无保障的另一个极端，使此情况更为复杂的是，早先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也会都失去了保障。此外，在有些国家，工资停停发发，没有保证，而且工资经常以实物相顶。

46. 经济转型国家的工作条件仍然很糟，而且频频发生意外事故和职业健康问题。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问题，尽管正在努力改善条件，特别是在十分“显露的”部门。不过，对工人露骨的剥削仍是许多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它影响着所谓“血汗工厂”的工人，包括青年妇女和儿童，他们经常在出口部门和服务业工作，极少得到当局的保护。只要有源源不断的人愿意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挣一份微薄的工资，目前受剥削的工人在近期内就无改善的前景可言，不过部分雇主已经认识到，改善条件和增加工资往往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人和雇主双方都得益。与此同时，煽动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情况时有发生，记录表明有的得到当局的支持有的得不到支持，成功的情况有限。发达国家也明显存在着血汗工厂式的工作条件，特别是在移民中，包括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近年来，问题似乎变得更严重了。

47. 工资差距和更普遍地说收入差距本来就很大，许多国家在过去十年中已明显拉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实际工资下降了，而在发达国家，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在有些情况下也包括中间收入，处于停滞状态或提高得很慢。在收入差距拉大得最明显的地方，较低工资者（包括非正规部门的工人）的收入停滞不前或有所下降，而已经属于高收入阶层的那些人的收入又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如果有关数据可以信赖的话，处于最穷和最富二者之间的收入范围即中间范围的情况变动很大，由于当地特定的原

因，包括结构原因及政策原因，产生了相当混乱和复杂的格局，国与国之间互有不同。

48. 在不同的收入领取者之间最终如何分配收入，是各种错综复杂过程的最终结果，这些过程往往起因于历史和一个社会的社会政治结构，也是当前各种经济、人口和政治过程的最终结果；该社会通过复杂的关系与其捆在一起的其他国家的发展变化也起着作用。任何国家当前的个人收入分配，通常都有一种特定和独一无二的解释。一种言外之意是，如果目标是使分配朝着某个特定方向改变，就需要实施不同的干预政策。另一种言外之意是，对于一种现行的分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可被认为是不公平的，以及为使它变得较为公平，哪些政策可能是有效和可以实行的，经常没有一致的看法。

49. 关于收入分配的数据经常是不可靠的，尽管其范围和质量都在不断改进，这使得对于分配正在朝着什么方向变动和所见到（或更可能是估计或推断）的变化因素难以得出一般性结论。尽管如此，显而易见的是在过去二十年中，主导的趋势是不平等程度加剧——在有些情况下非常引人注目——但也有相反的例子。在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时期，人们见到了（虽然依据不大可靠的统计资料）更大程度平等的趋势，但是在该时期存在着许多相反的情况。

50. 人们日益意识到收入差距正在拉大，而且贫穷的人数急剧增加，特别是在非洲，经济转型国家和亚洲各国，这些国家曾经干得很好，但由于最近的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而倒退了，这种认识促进人们重新对上述情况给社会凝聚力和稳定造成的后果展开辩论，而且在有些地方已导致人们重新研究现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51. 饥饿与贫困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缺乏购买食品的收入是贫困或营养不足或营养不良的主要根源，但是自给性粮食仍是家庭粮食主要来源的地方除外，不过这种情况只占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 5%至 10%，比例很低。

52. 全球一级粮食供应不足早已不再是世界饥饿和营养不足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在地方一级，将剥夺食品作为政治武器和自然及人为灾害造成粮食歉收继续是饥饿的重要根源，就如分配制度崩溃一样，尽管国家或国际人道主义机构或救济机构准备工作做得好得多，进行干预的后勤能力也大有提高。近年来，此类局部因素的重要性增加了。

53. 饥饿和贫穷分不开的另一个原因是，在统计上贫困的计算与对饥饿的估计是联系在一起的。估计全球贫困情况时用的是计算为获得最低限度热量摄入购买食品所需的收入数，而后者又以实际热量摄入的调查为依据。全世界饥饿人数估计数(大约 8 亿)与全球贫困程度估计值(大约 12 亿)的巨大差异表明估计不可靠。另外，由于相隔数年才估计一次，而且这期间估计的方法也有变化，因此对于全球饥饿(和贫困)变动的方向，以及这一老大难问题的解决情况实际上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可能存在着和经常存在着很大的意见不一就不足为奇了。

54. 饥饿程度的现有估计表明，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趋势。总的趋势是亚洲和太平洋区域逐步好转，营养不足人口的比例在最近二十年内大幅度下降。北非和中东也大有成效，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只略有改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结果有好有坏，可以获得数据的 8 个国家取得了进步，而另外 16 个国家则有所退步。

55. 由于收入水平与贫困程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国家一级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处于停滞或下降状态，国内营养水平的差距必然大幅度扩大；这些国家实施特别方案，向穷人提供补贴或免费食品，以及实施其他特殊方案，以改善儿童和其他易受伤害的群体，或有着特别需要的那些部分人口的营养状况，但它们只是部分缩小上述差距。

56. 生物技术的进步是最近的新事物，可能具有深远的影响，但又是具有争议的发展变化，它将有助于决定关于生产多少食品，以什么成本生产，将由谁来生产，

谁将有机会享用它，以什么条件享用，以及对健康和环境有什么潜在的危险等方面的未来。

57. 按下述指标衡量，全球人的健康状况有了改善：婴儿或 5 岁以下幼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预期寿命和长寿者更普遍，但也存在着某些局部和重大的例外。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前苏联，采用广泛的健康指标衡量，健康状况明显恶化。

58. 发达区域从 1970 年至 2000 年，幼儿死亡率从每 1000 人 26 名降至 9 名，发展中区域从 115 名降至 63 名(撒哈拉以南非洲从 143 名降至 93 名)；因而，有利于较发达区域的现有差距进一步拉大了。现在，发达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幼儿死亡率超过每千人 35 名，但几乎多达两倍的发展中国家——62%——超过这一水平。就 5 岁以下幼儿死亡率而言，达到或超过每千人 45 名的比较数字为零和 61%。就孕妇死亡率而言，低于 30 名比率的较发达国家占到了 71%，而欠发达国家只有 6%。发达区域的出生预期寿命从 68 岁提高到 75 岁，而欠发达区域则从 52 岁提高到 63 岁，这种情况表明两个区域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了。

59. 影响着众多人口的若干疾病继续是全球健康状况方面的主要问题。早些时候已被许多国家基本控制的某些疾病最近死灰复燃，部分原因是卫生条件恶化，住房低劣，拥挤和饮食不足，以及保健制度和预防措施出现失误，并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新的抗药性。疟疾是重新肆虐的一个鲜明例子，它现在影响近 3 亿人，每年造成死亡人数超过 100 万，主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在上个世纪，这种疾病的发病率稳步下降，1970 年前后降到最低点，但自那时以来又快速上升了。

60. 从长远来看，全球一级的死因发生了明显变化。目前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分别占到死亡数的 30%和 23%；在 1900 年代初，它们合起来造成的死亡数只占 15%，当时呼吸道疾病(占 20%)和其他传染病(占 13%)是主要的死因。

61. 正在演变中的全球格局是这样的：新的流行病正在出现而传统的健康问题又持续存在。非传染病——

较新的死因——现在占全部死亡数的 43%，在发展中国家占到 39%，而在发达国家则高达 81%。在这一类别中，最突出的依次是神经精神问题(发展中国家 10%，发达国家 23%)、心血管疾病(分别为 10%和 18%)和癌症(分别为 5%和 15%)，接下来是因伤致死，特别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在全球一级，据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计算，考虑到致残和过早死亡二者，此种事故给社会带来的“疾病负担”占到负担总量的 16%左右，神经精神问题占第二位，占到 10%。传染病和其他感染，以及产妇和儿童健康不良和残疾，传统疾病，继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单单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目前造成死亡人数 1400 万，而且目前全世界有 3300 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因吸烟而每年过早死亡的 400 万人中，绝大多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62. 发展中国家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情况：它们在未能成功遏制传统疾病的同时又染上了较发达国家的疾病，因而得应付双重挑战，而鉴于它们可利用的资源有限和保健基础设施不足，多数国家对此束手无策。

63. 商业性差旅增多；旅游和移徙；国家之间和各大洲之间食品交流扩大；病毒性疾病如流感、艾滋病和疟疾等传播面扩大，所有这些情况不仅使发展中国家，也使发达国家的保健服务系统面临巨大的挑战。大家越来越明显地看到，必须迅速地交流卫生信息和医疗资源(医生和技术)。与此同时，通信革命使得国内和国际上能够就传染病的流行病学调查、预防、监视、干预、监测和控制加强交流。有效的方法将越来越依赖于卫生工作所有多层面的真正的全球化。

64. 正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健康差距(甚至更明显的是保健差距)巨大一样，各国内部不同收入群体和不同性别之间卫生条件的差异也非常巨大。卫生组织的估计表明，在发展中国家，15 至 59 岁年龄组穷人与非穷人(按当地定义)之间死亡概率之比为男子 2.2 和妇女 4.3；0 至 5 岁年龄组的对应估计数字为 4.3 和 4.8。穷人结核病的发病率为非穷人的 2.6

倍。发达国家不同收入群体和社会群体的健康状况也有差异。不过，通常情况下，由于有综合的保健系统，快速上升的保健支出由公共资金补贴或提供资金，以及普遍健康水平稳步提高，差别越来越由与获得保健机会有区别无关的因素引起(少数最富的国家明显例外)。相形之下，在发展中国家，差距依然巨大，因为一般情况下公共系统甚至连提供基本医疗的能力都不足，近年来，装备最差的那些国家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

65. 它包括提供保健(以及生产能力)所依赖的安全水的能力；在发展中国家，这仍是个难以回避的问题，约有四分之一的国家仍然不能向大多数人口提供安全水。在适当的公共卫生方面，情况更糟，有三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向大多数人口提供公共卫生条件。依据人口数而不是国家数衡量，25%的人得不到安全水，50%的人没有公共卫生条件。

66. 住房使用面积和质量的差别，也许是高低收入阶层之间和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收入者之间生活水准差异最明显的体现。

67. 富国和穷国的城市，差距继续扩大。迅速的城市化和人口的变化正在改变住房需要。在多数发达国家，多数人基本上都有适当的住房，经济转型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平均标准和质量较低，而发展中国家却不能广泛提供适住的住房。主要问题是过分拥挤，住房质量差，缺乏适当的供水和卫生设施，特别是在越来越多的非正规居住区，这些情况给健康、安全和环境都带来了危害。无家可归原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现象，近来在发达国家也呈上升趋势，它加剧了城市地区的社会两极化和紧张关系。

68. 联合国住房指数方案的调查结论证实，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其住房面积较大，质量较高，供水和卫生设施也较好。就所有指标——每人使用面积、每个房间人数、永久结构的百分比和通水住房单元的百分比——而言，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不同收入群体间差距巨大。高收入国家住房的建筑质量也普遍好于低

收入国家。在最低收入群体中，住房远低于标准，不正规，而且往往是违章建筑。

69. 住房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说明由于难以采用公平地满足社会基本需要的方式分配资源而使市场严重失效。而且迄今为止，虽然有的国家作出努力成功地通过政府干预弥补市场失效，但别的国家未这样做，而且有的致使情况更糟。

70. 现在和过去一样，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各个社会面临的基本困境是，经济职能不同和挣钱能力大不一样但又相互依赖的居民凭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争得到有限的面积，而且还得与其他的商业用途和公共用途相抗争。市场产生的结果通常使穷人的住房过于拥挤，或将他们挤到城市的边缘，需要依靠数量不够的公共交通工具或使用昂贵的私人代步工具走很长的路上班。在发达国家，尝试了多种形式的公共补贴或公共住房，经常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从长远看也存在无法预料的困难。最近不再向较不富裕的人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政府支助，也促使贫困和无家可归的人增加。

71. 在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快速增长意味着适当住房的供应赶不上需要的增长。富人一般有能力获得适当的住房，但穷人却受到各种形式的排挤。初来城市地区能够在棚户区或违章建筑区获得立足点的人不得不忍受朝不保夕的生活，即使有能力对占用的住所进行临时修缮也无保障(或服务)可言。当城市当局清除这些居住区以备商用或建设高收入住房时还产生进一步的问题。

72. 从社会或公平角度观察，一个截然不同的住房特点是，经济繁荣往往对穷人的住房造成消极影响，因为他们被迫与花得起高价的作为买主或承租人的人们相竞争，从而将穷人挤出购买负担得起住房的行列。而且，在所有国家，适应新的就业机会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要求有一个活跃的住房市场，以便租赁或买卖住房，提供各种面积和价格不同的住房以满足人数不等和收入不同的家庭和个人的种种需要。在许多国家，不论是富国还是穷国，还达不到这些条件。在

公共住房上市出售、出租和分配时，公开和隐蔽的歧视又给千百万人造成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而这道障碍经常是最后拆除。

四. 社会弊病

73. 冷战结束时人们希望世界上没有战争，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的冲突以和平方式解决，但这个希望尚未成为现实。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平和冲突研究系称，截止 1997 年的十年期间，世界各地 69 个地方发生了 203 次冲突。1998 年，26 个地方发生了 27 次冲突，而 1999 年发生了 36 次冲突。

74. 武装冲突没有减少，但它们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其中多数目前主要发生在国内。现在进行冲突的不仅有正规军，也有民兵和几乎没有纪律约束的武装平民。一个特别令人不安的特点是大批儿童卷入了战斗行动。其中多数冲突，战斗断断续续，激烈程度时大时小，变化不定。许多冲突造成有组织的政府实际垮台，诸如警察和司法机构等国家机构陷于瘫痪，秩序破坏，盗匪四起，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破坏或抢劫国家资产。

75. 在有些武装冲突中，主要使用简单的自制武器，但多数情况下，战斗人员配备了精良的进口武器，依靠硬通货或用当地商品进行易货交易，这些武器得来似乎不费什么劲。

76. 武装冲突使人的生命丧失，经济、政治及社会解体，代价是巨大的。在过去十年中，估计各种武装冲突中有 400 多万人被杀害；大多数是非战斗人员。100 万人成为遍布 70 多个国家的 1.2 亿枚地雷的受害者。还注意到了对人民的其他长远影响：广泛的情绪和心理紧张；精神病；不安全感，特别是对妇女和儿童而言；流离失所和流亡；以及丧失受教育的机会。

77. 国内冲突一般牵涉分裂主义运动或谋求采用军事手段夺权的集团。酿成冲突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许多政府不能保证基本秩序和保护其人民，以及它们不能遏制小规模冲突并防止它们酿成大规模的冲突。在特别受到武装冲突折磨的国家中，一般基于种族、

宗教、民族特性或经济阶级等因素，各社会群体互不平等，反映出不能平等享有政治权力，从而阻塞了和平变革的道路。

78. 歧视仍然普遍存在，而且采用多种形式。虽然歧视一般无害，不过给人造成不便而已，但它能够表现为和已经表现为令人难以忍受的形式，能够有效地阻止某些群体充分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或迫使它们按不利的条件参与。它经常以各种方式酿成暴力。如果由此产生的暴力当局不予谴责，或当局实际上容忍公开的歧视，后果就变得特别危险。

79. 每个人对人都会有所区别对待，想避免也是避免不了的。人们喜欢满足他们需要的人，最类似于他们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具有吸引力的人。不论谁掌权，他都一般对现实作出解释，通常更看重他(或她)自己的属性或特点，而赋予他人以较低或从属的地位。在极端的情况下，在“我们与他们”之间随之产生两极化，使傲慢变成偏见，爱国主义变成沙文主义，防卫变成攻击和暴力。集体团结的反面往往是集体排他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存在的导致公开歧视的许多形式的偏见因教育的普遍提高而减少。人与人亲近熟悉往往会减少歧视。但是最近有许多情况表明这些规范显然并不灵验。

80. 应看到的另一个较新的趋势是现在歧视不大可能得到当局的支持。现在很少有哪国政府对与歧视妇女或老人或民族、语言和宗教群体有关的国际公约和其他文书的有效性提出公开质疑。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这些文书的规定纳入本国法律，而且最近更多的国家批准了各种文书。还建立了申诉机制或补救程序；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提供有用的申诉程序以对付所犯的不法行为。

81. 一个相关的发展是遭受歧视的群体认识普遍提高，他们更加不愿意对命运逆来承受，而且组织起来捍卫它们事业的能力也提高了。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残疾人的情况——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不过，在有些情况下，有力的宣传反而产生了反作用，而且有时激起了对目标群体更大的敌视。

82. 暴力(除了产生于武装冲突的暴力外)还一直是各个社会的一种苦恼，而且难以评估近来全球一级这种暴力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明显的一点是，一般来说，对待暴力，特别是对待特定形式暴力的态度一直在变。对它的容忍和接受程度降低了，而且尤其在商定的人权框架范围内正在竖起反对暴力的各种障碍。

83. 首先对以教族间暴力形式为重点的暴力定刑事罪，现在这种定罪正在扩大到私人范畴，这标志着在社会划分私人范畴与公共范畴的界线方面作出了重大的变动。这样，人们越来越将对家庭易受伤害的成员特别是妇女的暴力视为犯罪行为。与此同时，这种变化的强度和深度因社会而异，部分人士仍将家庭暴力视为私事，用文化规范将它合法化。

84. 在发生重大动乱如严重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动乱的国家中，暴力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它涉及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对抗时。可以看到，在此类因素与对妇女的暴力和形形色色家庭暴力的增多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联系。

85. 尽管妇女在生活的许多领域作出了重大成绩，在公共范畴和家庭范畴内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都依然存在。甚至在将对妇女的暴力定刑事罪的社会中，也还要做许多工作才能消除这种暴力行为。少女和年轻妇女继续特别易受父母、成年照顾者、熟人、丈夫和男友的虐待。对残疾妇女施暴或性攻击的现象特别普遍。在世界许多地区，强奸一直有增无减。武装冲突的各方也继续对妇女广泛实施暴力。移民妇女也特别易遭暴力行为的侵犯。贩卖妇女达到了巨大的规模，目前估计每年达到 100 百万至 200 百万。

86. 在全球，卖淫呈上升趋势。看来大多数妓女是因受到胁迫或欺骗而卖淫的。很大比例的妓女本身在儿童时代就受过性虐待。即使为社会所容忍，卖淫也基本上在法律之外经营，因此，妓女继续遭受人身暴力和性暴力，而且她们的“操作者”一般阻止想不干的人能够洗手不干。多数妓女系穷人家庭出身，多达 90% 在发展中国家，而在世界许多地方“性部门”的营业额做得很大，而且还在不断增长。

87. 在过去十年中，上报的对儿童的暴力事件明显增加。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称，在 1990 年代的武装冲突过程中，多达 200 万儿童被杀害，600 万儿童受伤或残疾，100 万沦为孤儿，150 万流离失所。性虐待已变得很普遍，而且贩卖儿童也呈上升趋势。尽管作出了努力，但穷国继续沿袭将儿童卖给人做苦役或卖淫的做法。1500 万至 3000 万儿童流落在大都市的街头，他们的人数还在增加，而且他们面临的剥削和暴力往往出自公众和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当局之手。在成年人的引诱下，儿童和青年吸食非法物质的数量增加了，这是一种新的和日益增长的暴力形式。5000 多万儿童从事危险的工作，并遭受主人的人身虐待。

88. 腐败不是新问题，但近来重新引起人们注意，而且在国际议程上占有主要位置。腐败是一种全球现象，似乎呈上升趋势，不过不易提供文件来证明，其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它不为人们随便承认，也因为采取许多形式，而且有些做法在一个地方被认为是腐败行为，在另一个地方就不被认为是腐败行为。

89. 最近有人对腐败作了新的深入调查，它产生于数种发展事态。在经济自由化和形形色色跨界交易——包括资金流动、借贷、服务和所有权贸易——增加的情况下，人们更加注意不同国家是如何经营商业的，更加注意它们的法律和条例、会计规则、税收法规和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不同企业文化的碰撞，以及在冒险进入新市场时外界人员坚持要求得到“公平赛场”，这些因素尤其有助于暴露以前掩盖或默认的做法。

90. 由于新近强调恰当运作的市场，对于分配资源和提高经济效率的有益作用和坚持进行改革以使政府也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使人们最近意识到，鉴于政府机构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大量资源，导致资源分配不当的腐败行为意味着有可能使社会受到大得惊人的损失。

91. 人们最近也认识到，腐败通常使普通人受到的伤害最大，同时又往往巩固既得利益者或强者和特权者

的地位。一般公众将腐败视为正在发生快速变革的世界的一个事关公平的大问题，因此对它也更不能加以容忍了。

92. 最近数十年，有组织犯罪的规模扩大了。贩卖人口、毒品和非法枪支的活动及洗钱活动蓬勃发展，创造了数以千百亿美元的地下经济。举例说，非法贩运可卡因、海洛因和大麻的利润估计达到令人吃惊的 850 亿美元；而每年花在毒品上的开支总额估计为 4000 亿美元。

93. 全球环境有利于合法的多国企业能够增长便利人员、资本和货物跨国界自由流动，这种环境同样也为犯罪分子在全球组织起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形形色色的贩运分子得益于全球化的积极方面，可以将罪犯和赃物轻而易举地从一国转移至另一国，到新的越来越广大的领土上悄悄寻觅受害者和招募人员，并将利润投资于能够保密和取得丰厚回报的各大中心。全球化的消极方面，如不公平的加剧、社会排斥的加深和贫穷阶层边缘化等也给犯罪分子创造有利条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穷人和年轻人，更易成为罪犯利用的诱饵和犯罪行为的“王牌”。

94. 因特网作为全球化的一个中心，正在迅速崛起成为有组织犯罪网络的一个主要帮凶。由于金融信息、技术和通信的快速发展，它们能够以快捷、便利和几乎没有被察觉危险的方式，将资金转移到世界任何地方，能够将“数兆位字节的钱”借用计算机屏幕上的符号转移数十次之多以摆脱执法官员的跟踪。此外，犯罪组织一直在充分利用新的全球经济中的金融避风港和海外中心以使它们的资产合法化。有人估计世界各地此类“匿名”公司的数目超过 100 万，而且每年洗钱的金额高达 5000 亿美元。

95. 因特网也是贩卖人口的老犯罪行为的新工具。关于色情作品、性玩弄者和恋童癖患者的网站大量增加，其“内容”提供者遍布世界各地，足以证明从事妇女、女孩和男童性贩运的犯罪团伙超越了国界。

96. 有组织犯罪的性质在不断变化,这是对政府和政府间执法机构的一个严重考验。光是它的先进性和复杂性就要求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许多层面上采用创新的合作形式。首先,有组织犯罪的爆炸性发展提出了国家作为保证穷人和边际人群得到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的角色的基本问题。

97. 人们可以感到有多种因素促成全球有组织犯罪在增加,但要描述全球普通犯罪的情况(例如殴打、杀人、抢劫和其他侵犯财产罪)仍比较困难。在有些发达国家,据报告有记录的犯罪呈总体上升趋势,特别明显的是经济转型国家,但其他国家却呈下降趋势。大城市的犯罪情况与警方比较有效的工作有着一定关系,但也同人口情况的变化有关。就多数情况而言,第一代移民——同祖国保持犯罪联系的少数人例外——往往是守法移民。

98. 对全球犯罪进行评估时应持谨慎态度,应当记住一般情况下统计资料只反映已报告的犯罪,因此只占实际犯罪的一部分。在各国内部,城乡之间和各大城市之间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这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发展情况。其他的决定因素也有作用,其中包括警方的可信度和国家作为法律执行者和司法执行者的可信度,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和土著人口的眼中,以及穷人、文盲、新移民和老人起诉的意愿和能力。这些因素使得难以直接比较各国国内和各国之间的情况。联合国关于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制度运作情况的调查说明了其他问题,其中包括犯罪法律定义的差异和计算、分类及披露的行政程序方面的差异。

五. 教育、技术和信息: 社会变化的主导方面

99. 教育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主角,而且教育的普遍进步,同学前直至博士后的教育事业的活力和普及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全球一级,教育已成为最大的“产业”,吸收着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 5%,而且产生和有助于产生的东西多得多。

100. 早期提倡普及公共教育将下述几项作为它的主要目标——现在仍继续追求它们——建设国家和实现国家一体化,传播共同的价值观,保证有一个强有力的道德组成部分,实现儿童社会化,指导年轻人扮演指定的成人角色。最近数十年中引起人们注意并将具有更大重要性的是教育的经济作用,因为它日益成为个人成功和社会繁荣的基础。教育与研究和技术革新相结合,正在改变生活的多数方面,实际上将改变生活本身。

101. 教育打开了大门,而且促进社会和经济流动性。但是它也可能将被排斥的人拒之门外,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起着分裂受过较好教育的人与较少受教育的人的作用。尽管受教育的机会很广泛,但机会不平等仍是大多数教育制度的一个特点,表现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接受教育的期限不平等,特别是,所得到的教育的质量不平等。

102. 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中小学入学率的普及。差异表现为小学生未毕业提前退学的人数或未继续接受中学后教育的人数方面,在这个方面,社会地位低与提前退出教育系统仍然有着较密切的对应关系。在这些国家,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迅速提高,而且政府已作出巨大努力鼓励家庭较不富裕的年轻人继续深造,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差距依然很大。这里,质量差别起着关键作用,在为穷人或少数族裔人口服务的地区,中小学的教学水平一般较低。受教育较少的父母往往不太重视这一点,并经常将这种态度传给后代。与此同时,有些社区,包括某些情况下的移民或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将教育视为提高地位的主要希望,并正抓住他们的机遇不放。

103. 所有发达国家都关注整个教育的质量。这表现为:雇主们经常抱怨说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人经常不符合工作的需要;有一项估计认为雇主用于矫正教学和在职培训的资金与整个公共教育预算的水平不相上下。这种关注还表现为经常提到在日益以知识为基础的开放的世界经济中,教育对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性。

104. 这两种关注当然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产生更大的作用，因为在这些国家，受教育的机会更为有限，一般也更不平等；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和低收入社区，现有的教育质量非常差，多数学校人满为患，资源稀缺，师资条件差，而贫穷社区的其他问题例如社区贫穷，学生经常生病或营养不够，而且经常缺课等则使情况更加恶化。

105. 另外，这几年来，小学甚至中学的入学率不断攀升，接近发达国家普遍的入学率。目前出现的最突出的差距是非洲和南亚为一方与其他发展中区域为另一方之间的差距。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小学的入学率已接近普及水平。在总的普及率仍落后的地区，主要原因经常是女孩的入学率非常低。

106. 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赞同男女孩全部可接受小学教育的目标。但实践中实现这个目标的障碍依然很难逾越。对于不同等级教育的相对优先次序也在进行激烈的辩论。小学和普及小学入学率其重要性超出了仅仅“上学”的意义。从长远看，经过几代人的时间，它们已证明对于社会转变和对于社会学家所说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更为直接的经济紧迫性往往说明扩大中学教育和中学后教育的重要性；实际上，人们发现这种教育也是实现高质量的小学普及教育所必需的。小学入学率的提高本身产生压力，促使增加更高级教育可提供的名额；而且实际上这种压力一直是有效的，部分原因是它们来自接受过较多教育的群体，具有较大的能力阐明它们的要求，也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当局。

107. 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学校系统很出色，而且所有国家都有极好的学校。令人烦恼和不易纠正的是许多国家的多数学校普遍标准低下。也可看到各个区域采取了一些零敲碎打的革新和改革措施，但是教育系统变革缓慢，而且传统势力强大。不可避免的是，产生的效果也慢，而且改革如果出错，就不易逆转，还可能留下长期的损害，这种情况已成为改革的抑制因素，尽管许多国家迫切需要进行改革。

108. 难以判断整个教育系统的质量是在提高还是下降，但人们普遍认为，小学教育，也经常包括中级教育，从教授和获得的技能来看，以及从为就业或为升入高等教育机构作准备来看，不能满足多数发展中国家快速变化的需要。在有些国家，情况肯定正在恶化；部分原因是资金较为有限，不过这决不是唯一或甚至主要的原因，因为证据表明，每个学生的经费远不是与所取得的教育成果有关的唯一重要因素。其他的因素如社会和文化因素也很重要，但是事实证明，指出不好的结果比解释其确切的根源较为容易。

109. 除了各国之间教育程度和教育系统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差异之外，各国内部个人之间的差异也很大，而且可以论证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差异正在增大。这些国家将面临接受教育机会不平等造成的不断增大的挑战，因为教育程度正在成为社会地位和经济前程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受教育的机会向有些人提供升迁的前景；在这一方面，技术开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通过所谓的远程教学，向来自农村或偏远地区和来自贫穷家庭的青年提供各种机会，有些国家正在利用技术这样做。但是，较典型的趋势似乎是这样的：已经受过教育和富裕的人们能够通过更好地掌握或巧妙地利用既有的机会巩固他们的优势地位，从而进一步拉开他们与社区其他阶层的距离。

110. 交流途径前所未有的技术大发展导致了許多重大的变化，包括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因特网在推进前沿知识及其实用方面作用不小。从发展中国家的观点看，新的“信息革命”是一个机会，可以获取全球信息和知识，并用于促进和加速发展。

111. 原则上讲，信息革命潜力巨大，它既可给发展中国家也可给世界各地处境不利和弱势的社会阶层创造各种机遇，能使它们获得各种信息资源，从而能以参与者的身分进入全球经济的市场。普遍和公平的利用机会对于使信息技术成为发展手段至关重要，但富国与穷国之间在利用率方面和因特网的联通率方面均存在巨大差距。即使在已联网的人中，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联通网站的速度和质量也是不平衡的。

112. 由于通信革命增大了信息流动的范围，也由于经济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专门技术”，现在经济受物质稀缺限制的程度降低了，而知识的掌握(包括知识的取得及其内容的形态)正在越来越不再是精英们和官僚机构的禁脔，而是传播范围更广了。

113. 迄今为止，对于因特网的利用将以什么方式影响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进程，信息革命产生的趋势仍没有定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使用信息技术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目前可能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并且正在争夺主控权。一种是使因特网商业化，它得到坚持从这类活动中获利的私营部门和有影响行为主体的支持，但它也将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种态度是使因特网成为社会转变的工具。由于因特网没有等级之分，也不受控制，它表现出了广泛的用途，它可以成为一个平等的场所，表达以前被人排斥的意见，因此，意见被排斥者可让人们充分听到自己的声音并参与提供和接受知识。在这后一种构想中，因特网将是思想和认识的关键资源，也是促进民主化的强大工具。

114. 目前，因特网和信息技术的两种用途并存着。不过，由于世界各地的采用率不同，目前尚不清楚两种用途在各国的相对影响。选择两种用途中某一种给社会带来的后果将至少部分取决于有关国家的发展状况和国内有关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

115. 信息技术和相关的发展已对组织生产和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更为一般地说，技术创新在中间货物、材料、生产过程、仪器、存储器芯片的使用和应用、集成电路和其他可编程控制装置及其相随软件方面一直特别重要和广泛。具有深远意义的最新发展是采用了在线交易，即电子交易或所谓的电子商务，尤其是在公司之间的交易中。

116. 早先时期，一系列技术推动的新消费品进入了市场，而且它们的使用范围从富裕群体迅速扩大到“平常百姓”，主要是因为大规模生产能够使单位产品价格不断下降。与这些时期相比，近年来向市场推出的新消费品寥寥无几——不过质量一直在改进——而且

推出的这些产品集中于电子和电信领域的数目有限的产品系列以及生物医疗和医药工业的产品。

117. 与此同时，为了出口和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广泛分散了基本和常用消费品的生产，发展中国的生产能力大规模扩大。不过短短的十年左右，各种家用耐用消费品如冰箱、炊具、缝纫机、电扇、收音机、电视机、录像机、照相机、电话、个人电脑及自行车、摩托车和甚至私人小汽车等的供应量增加了数倍，而且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低收入阶层。中产阶级消费者的生活方式现在已为更多的世人享受，但这种生活方式与无力享用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反差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引人注目，而且让人看得更加清楚。

118. 过去十年中，发展中国家成功地推广和应用“老”技术和商业性利用“新”技术方面的一个教训是，所需要的远不止限于“利用机会”和一个懂技术的人口核心。还需要各种支助网络，包括技术网络和专业网络，能够得到信贷和风险资本，以及支持或至少认可这样一些群体，因为他们可能感到他们的权力或地位正在受到挑战。支持这些群体——特别是精英群体——很重要，否则必须要有足够的群众支持革新以便克服希望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反对势力。在有些国家，移民——有时回到祖国——已成为利用技术机遇进行成功变革和创业的开路先锋。

六. 老问题，新挑战：平等及其道德含义

119. 这一部分的讨论集中于五大发展引起的道德、伦理和分配含义：全球化及其社会层面和公平含义；对于政府促进公益的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看法；从非市场方法转向市场方法以满足社会需要；私人范畴与公共范畴界限的变化；和生物医学方面的发展及其对人口和社会未来形态的影响。这一节比前面几节具有更大的猜测性。提出各种问题，也许没有明确的答案，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不打算预测未来是什么样子，也不提出应该订立的规范。相反，提出问题是因为它们显然需要进行有根有据的讨论；而且讨论也可能有

助于确定地方、国家和国际行动政策纲领的未来轮廓。

120. 讨论的开头先扼要说明对所谓“全球化”的一般理解。研究它的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审视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及其对未来社会形态的影响：(a) 迁移和旅行；(b) 知识、技术、信息、通信、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的全球拓展；(c) 有关公私两个范畴的思想、价值观、规范和标准的跨界传输和散布；(d) 全球经济由于下列情况日益相互依存：货物、服务、资本、金融、专门知识和劳动力更大的流动；(e) 对经济管理、管制和公私关系的看法趋同；(f) 经济组合；(g) 跨国公司和公司管治概念；(h) 经济监管的跨国机制。

121. 考虑到上述几点，提出下列问题。当前的发展是否会导致更大的文化同质性？如果是，将产生什么问题？同质性多一些是否总是坏事？普遍性(普遍价值观)与文化多样性是否有矛盾？如何达成适当的平衡？既然全球化能在不同的制度下发生，更多的市场驱动制度相对于更多的非市场或计划制度的含义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经济活动水平和经济结构相趋同或趋分？对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不平等现象有什么影响？需要遵守“自由贸易”的要求或保证提供国际经济交易“公平赛场”对社会政治领域的结构和政策有什么影响？全球化的不同过程，对国家主权施加了什么限制？(自愿接受的限制及其后果，例如加入关税同盟、其他区域安排和国际协定，以及情势施加的限制——经济、技术、政治限制。)谁——个人、群体、部门、产业、区域、国家——从全球化过程得益和谁在各种“制度”下受损？得益的是什么和损失的是什么？

122. 在简要说明各级政府规模、范围和活动方面的趋势后，概述关于政府促进“公益”责任方面的恰当作用的辩论情况及目前推动辩论的各种事态发展和力量。各国政府在如何适应满足公民需要当地和全球新情况方面以及如何适应他们对政府能够提供些什么的不断演变的期望方面，面临着挑战。对于这种挑

战，从四个角度进行分析：政府不同职能——作为提供者、促进者、仲裁者和调节者——之间最合适的平衡是什么？考虑到提供的效率和对人们不同需要的定义的适应性方面经常有着矛盾的需要，政府不同职能在哪一级(地方、区域、国家、国际)履行最合适？集中或分散组织服务的利弊各有哪些？如何能够通过政府干预调和社会不同群体和利益集团不同和不断变化的关注要求？在新的全球环境下，政府与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结成什么样的伙伴关系最合适？

123. 简要说明了有关问题和关于满足社会需要的市场和非市场方法的相对优点，特别是对于确保满足全体人民基本需要的相对优点的看法，接下来审查钟摆如何从赞成一种方法摆到赞成另一种方法和摆动的原因。很显然，钟摆一直在摆向基于市场的方法或准市场方法，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样一个论点的鼓舞：此种方法效率较高，并且使资源的分配能够更符合人民的需要和愿望。提出了下列需要进一步辩论和澄清的问题：支持效率论点的根据是什么？意识形态发挥什么作用？市场失效对后果有什么影响？由于市场方法缩小政治进程在决定根据谁的愿望行事方面的范围和作用，满足谁的需要，决定什么，由谁支付，它对不同群体有什么有利或不利的的影响？对促进“公益”的影响和实际上对公益的定义的影响是什么？

124. 关于公私范畴界限的变动，简要审议了三种不同但又密切关联的趋势，说明它们可能有的伦理及实践影响。第一种趋势涉及对满足个人而不是集体需要的重视程度的明显转移及其后果。第二种趋势涉及不受公私行为主体侵犯的隐私和自由。社会监视、监测、“窥探”在许多方面对社会是有益的，它有利于个人和保护个人，但它们也可能变成无端的侵犯和不可接受的社会控制工具。在这方面，技术如何改变了保护人民与控制人民之间的平衡和它如何影响隐私权的观念？增强监视个人行动、移动、言论和政治意见表达的技术能力，对社会行为、行动自由、言论和自主权有什么影响？第三种趋势涉及隐私和保密为一方，自由获取信息、广泛传播信息和方便获取信息的经济和社会重要性为另一方的冲突。

125. 生物医学发展的讨论集中于当代特别关注的生物伦理，以及为什么这些伦理对于社会的未来形态至关重要。讨论了对这些问题的可变的文化反应，并提出了下述问题：普遍伦理与文化多样性能够统一吗？

126. 讨论了生物科学和医学方面四项重大新发展提出的生物伦理问题及其对不同社会 and 不同群体可能

产生的不同影响：新遗传学；新的生殖技术；移植；和生命的医学延长。在此议题的最后，简要讨论了生物伦理与社会正义和人权的关系，以及生物医学的进步对人口趋势、结构和有关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